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唐宗古文運動

钱冬父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唐宗古文運動

钱冬父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唐宋古文运动

钱冬父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2.875 字数 47,000

1962年5月第1版 1979年1月新1版 197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0

统一书号：10186·66 定价：0.22元

目 次

一、駢文、古文和古文运动	1
二、古文运动的准备时期	7
三、唐代古文运动的中心内容和奋斗目标	15
领导者——韓愈和柳宗元	15
“志道”、“明道”和反对形式主义	18
作家的品德修养問題	22
“不平則鳴”和对现实的批判	25
創造新体古文的具体标准	28
培养青年作家,傳授創作經驗	32
四、韓愈、柳宗元古文的杰出成就	36
韓愈古文簡介	37
柳宗元古文簡介	50
五、唐代古文运动的趋向和衰落	59
六、宋代新古文运动	65
新古文运动兴起前的历史背景和文学思潮	65
新古文运动的三个重大問題	67
欧阳修等六大家的古文成就	73
七、結束語	85

一、駢文、古文和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是发生在八世紀至十一世紀唐、宋时代的一次文学运动，这次运动用简单的話來說，就是提倡散文、反对当时駢〔pián〕文的一次斗争运动。因为参加这个斗争的人数很多，有共同一致的要求与目标，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浪潮，经过长期的起伏奋斗，终于取得了胜利，所以大家把它称作文学史上发生的一次“运动”。

駢文和散文，在性质上和形式上都有所不同：駢文这个名称是从唐朝柳宗元开始叫起来的①，駢是二馬并駕的意思，它是由对称的字句組成，字句的音韵必須协调，最初原是为了便于上口誦讀而形成的一种有格律的文体；散文則不受那些严格形式的拘束。駢文起源于秦、汉，形成在魏、晋，到六朝大为兴盛，占据了文坛的統治地位。駢文的兴起，对我国文学的发展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它根据汉语文字的特点，組織成整齐美观的对偶形式，挑选色彩鮮明

① 当初六朝时候，还只叫駢文为“今体”，或是“丽辞”。柳宗元在他的《乞巧文》里方才开始把这种文体称作“駢四驥六，錦心綉口”，簡称駢文，后来又由此称为四六文。

的字句給人以美感，利用典故表达复杂的情景事物，促进讀者的联想，又注重音調的鏗鏘悅耳，增强文章的音响和节奏效果，使它富于音乐性。这些都大大地丰富和提高了我国文学的艺术性能和技巧，对散文也发生了良好影响。駢文中的优秀作品，除高度的艺术技巧外，也具有一定的思想內容，成为古典文学中的宝貴遗产之一，至今还受到我們的学习、傳誦和借鉴。

但是駢文发展到后来，产生了很大的弊病，它的末流，忽略了思想內容的重要意义，只去堆砌华丽的辞藻，玩弄数不清楚的典故，音調声韵方面的限制也愈来愈多，造成文风的萎靡和形式的僵化，因而就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或自由地描写各种不同类型的事物，同时也就不能真实地抒写作者的思想感情。它既然走进了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就成了文学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于是散文順应时势的要求，起来跟它进行斗争。

散文为什么被称做“古文”呢？原来古文有两个含义：一个意思是指“古代的文字”。公元前九十年，即汉武帝时，在孔庙的牆壁里发现了一种用古代大篆体写成的經书，与当时通行的今文隶字不同，人們便称这种文字为古文，在經学史上常常提到它。另一个意思是指“古代的散文”，这是八世紀和九世紀中唐时候的作家为了区别于称为“时文”的駢文，

給先秦、兩漢時代用散文形式寫的各种文章所提的名稱，後來把他們自己寫的散文也就叫做“古文”。它雖然同樣叫“古文”，但跟上面經學史上作為文字含義的“古文”，却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至於“古文運動”，它所提倡和學習的，也不是古代的文字，而是要求恢復古代的散文，用這來反對六朝的駢文及其末流。從此以後，古文便被確定為散文的代名詞流傳下來了。

駢文和古文的不同究竟在哪裡，我們且各舉一篇具體的作品來比較說明一下。

先來看一篇駢文。南朝的著名作家庾信（513—581，字子山，河南新野人）為了答謝一位王爺送馬給他，寫了一封《謝滕王賚馬啟》：

某啟：奉教垂賚烏驪馬一匹。柳谷未開，翻逢紫燕；陵源猶遠，忽見桃花。流電爭光，浮雲連影。張敞畫眉之暇，直走章台；王濟飲酒之歡，長驅金埒。謹啟。①

再來看一篇古文。唐朝韓愈為了給一個去世的官員王用寫了碑文，王用的兒子也送他一匹馬，皇帝

① 這篇駢文所用的典故如下：柳谷未開——張敞地方的柳谷有裂開的石塊，上有五匹馬的圖象，象徵晉朝代魏朝而興。紫燕——漢文帝有馬名紫燕。陵源——陶潛《桃花源記》里的武陵源。桃花——桃花馬；有雙關意思，又指桃花源。流電浮雲——馬名，都是漢文帝的良馬。張敞直走章台——張敞，漢朝京兆尹，下朝後走馬章台街。王濟金埒（lè，矮牆）——晉朝王濟愛馬，用金錢圍成矮牆養馬，人稱“金埒”。

准許他接受这个礼物，他也写了《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状》：

右今日品官唐国珍到臣宅，奉宣进止，緣臣与王用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男沼所与臣馬一匹，并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条者。臣才識淺薄，詞艺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备尽事迹，圣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并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跃，无任荣抃之至，謹附状陈謝以聞。謹状。

这两篇文章，都不是駢文和古文的代表作品，但內容同是答謝送馬的，很便于比較^①。庾信写的駢文滿是漂亮的詞句，每句都使用了关于馬的典故，其实只是这样簡單的几句：“承你送給我一匹烏騮馬，非常駿美而善走。今后，我可以騎着它出游和赴宴了。”可是讀者如果不熟悉这些典故，不去翻书，或者不看注釋，就只会被它字面的美丽所眩惑，无法了解它的真实含义是什么。駢文擅长的就是这种鋪張华美的表达方法，坏的駢文就更接近于文字游戏了。显然，这种文章沒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是看不懂、写不来的，它是为少数特殊階級服务的。韓愈写的古文就完全不同了，他沒有用一个典故，因为写这种事情实在沒有用典的必要，只須把自己接受这件

^① 这里所举的两篇例子，只是为了从形式上說明駢文和古文的不同之处。从內容来看，这篇古文答謝送馬的例子也只是应酬文字罢了。

礼物的謝意表达出来，而对方也很容易看懂就够了，用不着再去借助一些美丽空洞的詞句。应酬文字如此，文学作品也是一个道理。对照了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出駢文的空洞和做作，古文就自然、朴实得多，而它的讀者对象就比较广闊。古文和駢文的不同，基本的区别就在这里。

古文运动除了要求从形式上反对駢文对于文字的拘束限制外，还要求从思想內容上反对駢文的空虚无聊和浮华輕艳。所以古文除了有古代散文的含義外，还有“古代道統”（圣贤之道）的含義。因此古文运动从形式到內容都打着“复古”的旗帜。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人韓愈說过这样的話：“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讀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学古道則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欧阳生哀辞后》）另一个领导人柳宗元也提出文学創作的目的是为了“明道”（《答韦中立論师道书》）。他們說的“道”，就是指古文运动的思想內容，但是这个“古道”只是运动当时所需要并且經過他們改造过的儒家的“道”，不可能跟他們口头标榜的所謂古代的“道”完全一模一样。

古文运动历来只指唐朝中叶韓愈、柳宗元活动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可是还不能包括整个古文运动。在韓、柳之前，古文运动就已开始它的准备时期了；在他們之后，宋朝初期欧阳修等人領

导的新古文运动，方才真正完成了古文运动对駢文末流斗争的历史使命。所以古文运动前后经历了約有四百多年的时间。我們这里要讲的，也兼指这个运动的准备时期和唐、宋二代而言。至于明、清两代所发生的几次新古文运动，虽然也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继续，但斗争对象和具体情况已經不同，就不在这里叙述了。

二、古文运动的准备时期

任何时代的文学艺术，都是从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里面产生出来的，并且都是通过复杂曲折的形式，为那个时代的政治路线和阶级斗争服务的。在一定时期内，文学艺术上出现了某种强烈倾向的潮流和运动，它就不能不是那个时代社会的剧烈变化和斗争的反映，现在所讲的古文运动，也不例外。

整个古文运动期间的基本政治形势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和矛盾，代表豪门贵族大地主利益的阶层和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阶层之间的反复不断的斗争。贵族大地主阶层和中小地主阶层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斗争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反映。这是因为新兴的中小地主阶层的人物大都出身于较贫苦的或没落的地主家庭，和人民群众有一定联系，了解民间疾苦，他们的政治主张，其出发点虽然还是为了巩固封建地主的统治，但却多少反映了农民阶级的一些愿望与要求，因此使得他们在那个时代里具有较为进步的色彩。

他们在文学上也采取比较进步的主张，倡导革新和发展，反对陈腐保守。古文运动基本上反映了

这个阶层在文学上的斗争性与进步作用。唐、宋古文运动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中小地主阶层在文学上的代言人。古文运动的第一个斗争目标，就是反对骈文的统治地位，实现进步的文学主张，用古文来代替骈文，使散文适合群众的需要。

早在韩愈和柳宗元出来领导并展开古文运动之前一百多年，古文对骈文的斗争就已开始酝酿，并且见之于行动了。这一百多年的期间可以称之为古文运动的准备时期。这个准备时期做了三件重大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发出了古文对骈文斗争的信号，第二件事情是虽不完备、但是初步奠定了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础，第三件事情是进行了古文的创作实践的尝试。

现在先谈这个时期的第一件事情。在韩、柳之前，古文对骈文发出斗争的信号，曾经有过三次：前两次是由新兴王朝的统治者发出的，后一次是由新兴中小地主阶层的代表发出的。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看到了文体和文风改革的必要，另一方面也各有自己的政治目的。

六世纪中期，西魏文帝大统十年（公元544），出现了要求用古文代替骈文的先声。掌握实际政权的宇文泰（他是北周的开国皇帝）和苏綽，不满当时浮艳不实的文风，提倡用古奥的商、周时代的《尚书》诘命文体来代替骈文。便有一个文臣柳庆响应他们的

号召，首先用古文写了一篇贺表，算是一件创举。第二年，苏綽亲自模仿《尚书》诰命体裁撰写了一篇皇帝祭庙的《大诰》。同时朝廷规定，所有文告、奏章都要用这个体裁来写。可是《尚书》式的文体太古奥了，不适合实际的需要，这一改革不久便失败了。然而，这却是号召改革的第一个信号。

过了四十年，即将完成统一事业的隋文帝杨坚，也看到了文风问题。当时的文章，讲究词句新巧浮华，内容不出吟风咏月。杨坚认为这种文章不利于一个新兴王朝的统治与建设，他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在开皇四年（公元584）下令：不论公私文翰，一概实录，不许用华艳的词句来写作。接着，又把一个用华艳词句写了文表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办罪，作为惩戒榜样。随后，有一个李諤迎合文帝的意志，从崇实尚用的观点出发，上书给隋文帝，严厉批评当时的公私文章“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上隋高帝革文华书》）。建议加以禁止。李諤对当时文风的批评，比隋文帝进了一步，已经初步接触到具体的内容问题；比起宇文泰和苏綽只着重于文体的“复古”，更是大大跨前了一步。这种号召，一时声势很大。不过事实上，隋文帝和李諤反对的还只是一般文风现象上的华艳词句，没有能够接触问题的本质。他们甚至连骈文这种形式也并未反对，象李

諤的奏章就还是用駢文写的。但是华艳恰是駢文不能缺乏的主要因素，反对华艳当然也就部分地打击了当时駢文的威势。所以这也是一次改革的信号。不过这次自上而下的改革，虽然依靠了行政命令来推动，可是因为偏重形式现象，并且缺少群众基础，改革的时机也不够成熟，因此和宇文泰、苏綽的改革一样，也没有能够掀起一个象样的运动。

这样，又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光景，駢文依旧维持着它的统治地位。就象号称“初唐四杰”的王勃（650—677，字子安，山西河津人）、骆宾王（约640—？，浙江义烏人）等那样优秀的作家，他们虽然在内容上比前代作家有了新的表现，但还是不能摆脱駢文形式格律的拘束。例如王勃的名作《滕王阁序》，骆宾王的名作《讨武曌〔zhào〕檄〔xí〕》，都还只能采用駢文的形式。可见改革的时机还没有到来。

七世纪末，武则天在位的时候，一个宏亮的要求文学改革的声音响起来了。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陈子昂（661—702，字伯玉，唐代文学革新的先驱者）发出了有力的文学革命的信号，他的那篇《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被认为是唐代文学革命运动的重要宣言：

文章道弊（傳統衰落）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傳，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間詩，采繁竞丽，而兴寄（比兴寄托）都絕，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

恐逶迤〔wēi-yí〕頹靡，风雅(《詩經》的风雅傳統)不作
(不能振作起来)，以耿耿也(心中耿耿不安呵)!

这里，陈子昂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問題，作为文学革命的标識：其一是要求恢复《詩經》的“风雅”和汉、魏的“风骨”，作为这些傳統的特点便是文学与现实的密切結合。其二是他举起了“复古”的旗帜，但“复古”在这里只是当作文学革命的手段。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阶级沒有出現之前，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現象中的革命运动，每每只能借重于复古的名义，陈子昂提出这个口号，也是这样。这是运动准备时期的第三次也是最有力的一次要求改革的信号。

陈子昂的具体主張，同后来古文运动的主張并不完全相同，他在文学傳統方面強調学习汉、魏、晋作家的优良傳統，而古文运动的領導者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韓愈《答李翊书》)；在文与道的关系上，陈子昂并不十分重視儒家的道統观念，从他所继承的六朝文論傳統看，他主張的是文质并重。此外，他的主張系针对詩歌創作而发。但是，由于陈子昂的鼓舞和推动，整个一代的作家卷进了文学革命的洪流。这就是他的重大功績。韓愈和柳宗元等人每逢提到唐代的文学革命运动时，总是一再把陈子昂当作開創一代文风的先驅者来看待的，这說明古文运动的領導者承认陈子昂对这个运动的先导作

用。而古文运动准备时期的第二件事情——理論基础的初步奠立，也是受到了陈子昂发出的战斗信号的启发后开始的。这时已經进入了八世紀即唐玄宗到唐代宗的时代。

这里需要說明，所謂初步奠定古文运动的理論基础，意思就是：一方面在思想內容上树立一种新的标准，另一方面則在形式体裁上也树立一种新的榜样。

这个时候，由于佛教的兴盛，老庄思想的泛濫，以及由于这些所造成的思想上的混乱，于是在政治上和在思想領域里，一度衰蹶不振的儒家正統思想被迫抬起头来，統治階級也接受了失敗的教訓，利用儒家思想来加强它的統治力量。为了适应这种要求，这时的古文便在思想內容上把儒家的經典《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作为它的依据和标准。唐玄宗时代有名的古文作家蕭穎士（717—768，字茂挺，兰陵〔今属山东〕人）和李华（715—766，字遐叔，贊皇〔今属河北〕人）便大力加以提倡。蕭穎士自己說，他除“經术之外，略不嬰心（放在心上）”（《贈韦司业（述）书》）。李华也說：“文章本乎作者。……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尚書崔孝公集序》）紧接着，唐代宗时代的韓会（737—779，河南孟县人，他是韓愈的长兄）和代宗、德宗时代的柳冕（生卒年不詳，大历、貞元間人，字敬叔，河东〔今

山西永济]人),先后提出了文章教化作用的问题,这就是要求文章要以儒家规定的道德教条去教育人们。韩会认为文章必须合于“圣人之情”,这样方能“助教化”、“备劝戒”(《文衡》)。柳冕也认为“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与徐给事论文书》)。从萧颖士到柳冕,奠定了古文以儒家思想为根据的理论基础;对后来古文运动的发展影响很大。但是他们的理论的片面性也是很明显的,这就是他们不适当地夸大了儒家道德观在文章中的作用,形成一种单纯强调复古的倾向,因而忽视了文学的艺术性能,这是不符合文学革命的目的的。

这个时候,古文在形式体裁上树立了一种什么样的标准呢?为了树立古文形式的标准,首先便应对当时骈文的形式主义倾向进行批判。唐代宗和德宗时代的独孤及(725—777,字至之,河南洛阳人)出来正面抨击了当时骈文的弊病,他说:“其风流荡而不反,乃至有饰其辞,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内容愈加空洞)。及其大坏也,儻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楷摹[gù-gǒng, 刑具],拳拳守之如奉法令。”(《赵郡李华中集序》)他提出了文章应当师法两汉——主要是贾谊、司马迁和班固,他们的文章就是古文在形式体裁上所应遵循的榜样标准。这个榜样标准后来为古文运动所接受。自称是独孤及学生的梁肃(753—793,字敬之,一字宽中,